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2.03.004

滞胀风险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

汤凤林^{1,2}, 甘行琼²

(1. 重庆工商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重庆 400067;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近期我国经济呈增速趋缓、物价攀升的边际滞胀态势。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红利减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和制度不完善,引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企业成本上涨和公众的高通胀预期。借鉴国内外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研究,我国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保投入,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善科技投入体制,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关键词:滞胀风险; 边际滞胀; 滞胀治理; 人口红利; 通货膨胀; 通胀预期;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结构性减税

中图分类号:F123.16;F8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3-0028-07

Polices Choice for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in the Risk of Stagflation in China

TANG Feng-lin^{1,2}, GAN Xing-qiong²

(1. School of Financ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the economy of China is in a marginal stagflation situation with slow growth rate and the rising of price. The main factors hindering high-speed economy growth of China include the reduced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low conversion rate of saving to investment and imperfect institution, however,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inflation are the erasing of government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the increasing enterprise cost and the high public inflation expectations. Based on the stagflation governance experience and theory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levant researches, China should adjus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mprove labor income share,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implement structural tax cut, perf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put system, complete legal system for the property rights, household register, social security and administration, clarify money-value stability objective of monetary policy and rationally guide inflation expectation.

Key words: stagflation risk; marginal stagflation; stagflation governanc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flation; inflation expectation;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structural tax cut

* 收稿日期:2012-02-28; 修回日期:2012-04-06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SKH18)

重庆工商大学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0851004)

作者简介:汤凤林(1974—),女,湖南益阳人;讲师,在读博士,在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任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习,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实践研究。

甘行琼(1966—),女,湖北公安人;教授,博导,博士,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任教,主要从事财政制度比较研究。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各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政策措施挽救经济。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矛盾以及互联网时代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外部性,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在通缩与通胀并存中摇摆复苏(郑良芳,2011),但美、欧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变得更加黯淡(金三林,2012)。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扑朔迷离,以至于学界难以作出一致的判断。尽管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增速呈递减趋势;就业增长依然缓慢;物价水平却一路上扬,大有不可遏制之势。学者们在提出防通胀的同时,又担心陷入增长停滞的两难境地(刘澜飏等,2011;柳欣,2010)。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正值转型的关键时期,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准确把握,关系到未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正确制定与有效实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剖析未来阻碍经济快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意义十分重大。

本文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进行了考察,通过引入社会总生产函数构造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货币经济学理论分析引发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从劳动力与资本的数量增加和要素效率提高、制度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合理化等方面提出应对滞胀风险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面临滞胀风险的现实考察

1. 我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风险

“滞胀”是指经济停止增长且有通货膨胀的经济状态。本文研究的滞胀是一种边际滞胀,即经济增速趋缓且通货膨胀攀升的经济状态。尽管“滞胀”一度被认为在中国是最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特征(尹碧波,2007),然而,从下面几项指标来看,现阶段我国经济正面临边际滞胀的风险:

(1) GDP 增速下滑, CPI 持续高涨。2010年初我国 GDP 增速达到顶峰 11.92% 后一路下滑,到 2011 年末时仅为 9.2%; 物价指数则从危机时的低迷迅速回升,由 2010 年初时的 2.2% 持续上升到 2011 年第四季度的 4.6%。

(2)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不乐观。虽然滞后指数仍在回升,但一致指数在震荡中呈下降态势,先行指数也持续下跌,到 2011 年末两者仅为 99.8% 和 100.2%, 发出较强的经济衰退信号。

(3) 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在消费者预期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下跌的影响下,消费者信心指数从 2010 年初开始下滑,虽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却仍然无法改变持续下滑的态势。这表明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就业状况、物价上涨等方面的满意度下降,对未来经济有担忧,意味着消费需求可能进一步减少;研究表明,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失业率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说明失业状况可能趋于严重。

(4) 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我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 2010 年初的 55.8% 下降到 2011 年末的 50.3%, 直逼制造业衰退的临界点 50%; 企业家信心指数也由 2010 年初的 79.5% 下降到 2011 年末的 68.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经营者对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示投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2. 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从理论上讲,若社会总生产函数为 $Y = F(K, L)$, 劳动力、资本(假设土地总量不变)等要素投入数量和各要素生产效率将影响经济增长。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增长、人口年龄构成及就业状况等,资本数量取决于资本存量、折旧率、社会总体储蓄率、储蓄—投资的转化率等,劳动效率的高低由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即积累的人力资本)决定,资本效率的高低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知识和技术通过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则通过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进而决定实际产出能否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可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失业率、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投入数量和增长速度、生产技术水平、制度等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持续上涨。根据货币经济学理论,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从供给角度来看主要是产品成本的上升;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政策因素使货币供给过多,导致市场上

流动性过剩;同时,公众过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对实际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从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现阶段,导致我国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的因素主要有:

(1)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指一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蔡昉,2010)。充足的“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然而,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0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由50.2%上升到63.1%,抚养比例持续下降。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我国的“人口红利”将于2018年左右消失,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受到劳动力资源的约束。此外,我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也日益突出。城乡大量失业人口与沿海各地“招工难”、“用工荒”并存,劳动力市场价格看涨;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转变,而劳动力供给转变相对滞后;企业需要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招募日益稀缺的技术性人才,劳动者则因为日益增加的城市生活成本倒逼工资上涨。总之,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泡沫经济吞噬了一部分“人口红利”,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经济增长。

(2)储蓄—投资转化率、投资效率、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经济增长方式急需转变

尽管城乡居民的巨额储蓄曾经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投资来源,然而,由于国民的高储蓄、低消费,我国经济步入恶性循环:低消费率—市场疲软—投资利润率下降—市场主导的投资减速—生产下降—失业增加—收入预期不好—低消费。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让国有银行以较低的利率贷款给国有企业,银行的坏账风险由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但这种做法却助长了国有企业投资的盲目性,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和严重的产能过剩(任志军,2007)。可见,非市场方式的利益驱动最终只能是扭曲投资,降低投资效率;而解决的方法是促进经济增长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

转变。另外,三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国面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压力日益严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急需向集约型转变。然而目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限,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产业结构优化受阻,这也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现有制度体系部分阻滞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制度的不合理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会加重收入分配不公平,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无端损耗与浪费,从而使经济产出无法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目前,我国以国有产权为主体的产权制度阻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缺乏流动性的社保制度等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致使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了劳动的收入份额偏小,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水平低,就业与收入预期不确定的现实约束下,居民谨慎消费、增加储蓄,结果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还导致了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此外,不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导致制度的“非中性”或“真空”,从而产生权力寻租,扭曲微观主体经济行为,使资源配置无效或低效。

(4)国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国内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

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发达经济体失业严重,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虽然短期内该政策改善了本国或本区域经济状况,却在全球范围内带来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不但进入我国外汇市场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迫使央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而且抬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增加了进口成本,给我国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增加4万亿投资,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等的补助;实施结构性减税,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行增值税转型;实行赤字预算,增加国债发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放松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

的硬约束。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以远超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形成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此,2010年底我国改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后多次反向调控。即使如此,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5)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等投入品价格上涨导致企业成本增加

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加剧,致使我国企业用工成本增加。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土地、能源及原材料日益稀缺,土地价格大幅上涨,能源和原材料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进口。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使石油价格节节攀升,全球泛滥的流动性推高了大宗进口商品(能源、基础原材料和农产品等)的价格。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减少了农产品供给,游资炒作更是对农产品价格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企业生产的环境污染成本被要求内在化,节能减排的任务无疑会加大企业的技术开发成本。而企业各项成本增加的结果是产品价格提高,工人生活成本增加,工人要求工资上涨,企业成本进一步增加,推动企业产品价格进一步提高,最终导致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6)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强化和自我实现加剧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预期是公众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及其幅度大小的一种预计。由于公众预期具有滞后性、盲目性和偏差性的特点,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往往高于实际通货膨胀,从而对实际的通货膨胀产生放大的效果。在高通货膨胀预期下,消费者会因为担心价格还会继续上涨而愿意用较高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劳动者会提出增加工资以防止实际收入减少;生产者则会乐于以较高价格出售产品,并在利润提高的情况下答应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此时,尽管实际产出没有发生变化,但物价水平上升了;而上升了的物价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在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地自我强化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我国的股市、房市价格就经常受到公众预期影响而不断攀升,给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难度。因此,高通货膨胀预期也

是通货膨胀形成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治理滞胀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1. 有关滞胀治理的理论概述

第一次世界经济大危机后,在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获得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然而,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使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凯恩斯政策失灵,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滞胀治理对策的探讨。

以Friedman(1977)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反对国家过多干预,主张“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以Lucas等(1978)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在完全信息假设下,提出政府干预无效,主张固定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以制止通胀;以Laffer(1974)和Feldstein(1981)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滞胀”的根源,主张大规模减税,以增加供给的方式抑制通胀;以Stiglitz等(1988)和Mankiw(1988)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从价格粘性角度提出劳动力、商品和资本市场不可能完全出清,政府有必要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也有部分学者从其他视角提出了解决滞胀的思路。Lutz(1981)强调工业民主和社会合作在消除滞胀中的作用;Meade(1982)认为可通过制度安排固定工资,以避免成本推动型通胀;Nitzan(2001)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并购有助于滞胀危机的解决。

尽管目前各界对我国经济是否陷入“滞胀”存在异议,但针对我国经济增速减缓、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现实,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应研究,并提出了如下治理对策: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进行大幅结构性减税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培勇,2011;刘尚希,2011;杨志勇等,2011);财政政策应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来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黄志强,2011;马树杰,2011)。二是应该科学调整货币政策目标和合理使用货币政策工具(陈华等,2011)。三是应该调整宏观调控的重点(潘宏胜,2011)。四是要推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田雪原,2011;郝雨时,2011)。五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郭其

友,2011)。六是推行资源价格改革,实行补贴能源价格替代行政价格管制(郝雨时,2011)。七是建立全民社保体系,降低居民的谨慎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郝雨时,2011)。

2. 当前我国反滞胀的政策建议

(1) 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增加劳动力人口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使我国总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也带来了人口急剧老化的问题。据研究估计,2015年我国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将停止增长(汪小勤等,2007),203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最大时(漆莉莉,2004),总抚养比将再次超过50%(孙鹃娟,2007)。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沉重养老负担,二十年后很可能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增长。因此,为避免人口总数下降且急剧老化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人口政策需要提前进行渐进转型,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用妇女教育政策替代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儿育女的成本上升、时间后移,同时养老社会化使生儿育女的收益下降,越来越多的夫妇选择推迟要、少要、甚至不要孩子,人口的控制无须政府采用计划生育政策,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方式得到解决。因此,我国可采取政策替代策略,将计划生育经费用来建立妇女教育基金,资助育龄妇女读书。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少要孩子,其教育孩子的水平也就越高,这样既控制了人口数量,又提高人口素质(薛涌,2009)。当然,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之初,因过去被压抑的生育欲望释放而会带来人口的增加,但二十年后其正好成为我国老龄化时期的青年劳力,可弥补适龄劳动人口的不足。此举可“一箭三雕”。

(2) 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储蓄率过高,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使劳动的收入份额偏低。因此,要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劳动的收入份额,使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至少达到50%以上;要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促进中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其获取收入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中等收入者对未来的

预期,提高其消费倾向。这样才能自动降低过高的储蓄率水平,解决以国有企业为投资主体而带来的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从劳动力成本提高角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使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3) 加大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质量

目前我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保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增加其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能提高现有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技能,减少结构性失业;能提升妇女的素质,进一步改善未来人口质量,提高下一代劳动生产效率以养活更多的老龄人口;能让现在的成年人(即未来的老年人)接受更多的教育,以便其即使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继续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能直接提高现有劳动人口的身体素质,还能降低老年时的医疗费用支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人们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我国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服务的投入力度。

(4) 推进结构性减税,刺激消费,调节供给

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具体来说,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以便更有效地抑制房价,消除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过度依赖;提高资源税税率,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将经济活动主体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促进资源节约;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逐步改分类征收为综合征收,减少高收入者逃税通道;以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科技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提高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减轻因投入品价格上涨、环境污染成本内在化所带来的压力,减少进口依赖,降低输入性通胀的风险。

(5) 完善科技投入体制,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科研投入总量严重不足,且有限的科研经费分配也极不合理。具体表现在:绝大部分科研经费投往大学和政府研

究机构,企业获得科研经费支持非常少,导致产、学、研脱节,科技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较少的企业科研经费中大部分投向了国有企业,而国企的垄断地位和产权虚置使其研发动力不足,有研发动力的私人营业却很难获得国家科研经费支持;此外,由于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不完善,大量科研经费被利益集团所瓜分,加上行政主导的科研体制导致人才逆淘汰,外行指导内行,大量决策失误,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投入体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6)完善产权、户籍、社保和行政法律制度,营造良好的企业运行环境

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系列用来规范人们生产、交换与分配行为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有效的制度能较好地界定经济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保护产权,激励人们进行有效的经济活动,将生产尽可能地推进到生产可能性边界。然而,经济所面临的外界条件经常会发生变化,若制度体系没有进行适应性调整,经济将无法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此时,高效率的经济活动要求制度变迁。国有产权虚置及其非市场合约的特质决定了国有经济的局限性,因此,要加快产权结构调整,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的市场份额,壮大私有经济,让市场去充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要改革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户籍制度,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社会保障制度,以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的有效流动;要进一步完善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种制度的不完善而导致的租值耗散,为企业市场运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7)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实现货币发行总量的有效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由以经济增长为主转移到了以币值稳定为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币值稳定的目标经常遭受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我国当前的谨慎性货币政策就体现了在“保增长与防通胀”目标权衡中侧重了前者,即暂时性地容忍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增长。

其实,货币政策是一种需求管理政策,货币手段只适合解决短期问题。而经济增长属于长期问题,解决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能使用短期的货币政策工具,经济增长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范从来,2010)。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这一点早已为西方的经济理论与现实所证明。当失业率上升时,稳定压倒一切,充分就业也经常成为货币政策的目標。货币政策目标的多元化与不确定往往使货币政策失效,导致货币超额供给,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未来要明确货币政策的币值稳定目标,以实现了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

(8)加强信息披露,有区分地引导不同收入群体的通货膨胀预期

高通货膨胀预期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而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主要受经济中已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影响。现实中,我国居民主要依据消费价格指数变动形成通货膨胀预期。然而,不同收入居民对物价上涨压力的感受不一样,从而形成不同的通货膨胀预期(申晓梅,1993)。高收入居民对一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他们更多地关注投资品价格变动,对利率股价等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敏感,有条件获取市场信息且能有效地鉴别信息真伪,相对而言能较好地形成合理的通货膨胀预期。中等收入居民已经解决温饱问题,但又不富裕,他们的高档商品消费能力有限,比较在意与提升自己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活用品、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变动;出于预防动机,他们愿意且能够进行一定数额的储蓄,对于利率的变动不如高收入者敏感;能有成本地获取并适度利用相关信息,但不容易形成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低收入者收入仅能满足生存需要,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较弱,对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变化十分敏感;受自身条件所限不易获取准确信息,难以形成合理的通货膨胀预期。因此,调控通货膨胀预期,要根据不同市场的价格变化、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政策透明度,建立健全价格信息披露机制,是帮助公众形成合理通货膨胀预期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蔡昉.2010.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4):4-13.

陈华,刘宁,刘志威.2011.宽松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适时调整[J]. 价格月刊(1):1-9.

范从来.2010.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J]. 经济学家(7):83-89.

高培勇.2011.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是重头戏[N]. 人民日报,2011-12-16(4).

郭其友,陈银忠,易小丽.2011.汇率变动、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的动态关系[J]. 经济学动态(3):65-71.

郝雨时.2011.我国新一轮通胀的特点及对策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9):75-80.

黄志强,等.2011.高度关注经济下行风险[J]. 中国银行中国经济金融展望季报(4):1-18.

金三林.2012.2012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及发展趋势[J]. 农村金融研究(12):40-43.

刘澜飏,宫跃欣,张靖佳.2011.2010—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评述[J]. 经济学动态(6):22-28.

刘尚希.2011.积极财政政策重在改善结构[N]. 经济日报,2011-12-31(6).

柳欣.2010.滞胀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选择[J]. 经济学动态(6):53-62.

马树杰.2011.应对2011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措施[J].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9):68-71.

潘宏胜.2011.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与货币政策取向[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6):41-48.

漆莉莉.2004.“人口红利”期的财政政策[J]. 财政研究(12):18-19.

任志军.2007.对储蓄—投资转化率和投资效率双低的思考[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4-98.

申晓梅.1993.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通货膨胀治理[J]. 经济问题(11):43-46.

孙鹂娟.2007.人口红利与人口老龄化:机遇与挑战并存[J]. 中国图书评论(9):20-24.

田雪原.2011.通货膨胀、劳动力市场与工资率走势[J]. 财贸经济(7):5-12.

汪小勤,汪红梅.2007.“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学家(1):104-110.

薛涌.2009.怎样做大国[M]. 北京:中信出版社:116-117.

杨志勇.2011.结构性减税与税改之道[N].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2-31(5).

尹碧波.2007.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非典型滞胀特征[J]. 财经科学(11):57-62.

郑良芳.2011.2010年全球经济在“滞”与“胀”中摇摆复苏[J]. 武汉金融(1):21-24.

FELDSTEIN M. 1981. The tax cut: Why the market dropped [J]. Wall Street Journal,11:357-373.

FRIEDMAN M. 1977. Nobel lecture: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5:540-568.

LAFFER A B. 1974. The Bitter Fruits of Devaluation[J]. Wall Street Journal,1:18-39.

LUCAS R E,THOMAS J S. 1978. 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A]//After the Phillips Curve: Persistence of High Inflation and High Unemployment. Conference Series of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19:205-240.

LUTZ M A. 1981. Stagflation as an Institutional Problem [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V(3):130-158.

MANKIWI G N. 1988.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Keynesian cross [J]. Economics Letters,26(1):7-13.

MEADE J E A,UNWIN. 1982. Stagflation [J]. Wage Fixing, 1:233.

NITZAN J. 2001. Regimes of differential accumulation: mergers, stagflation and the logic of globalizat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8(2):226-274.

STIGLITZ J E, GREENWALD B C. 1988. Examining Alternative Macroeconomic Theories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207-260.

(编辑:夏冬,校对:段文娟)